
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

王奇生

七七事变发生后,在日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愤然返国。此次归国行动与以往不同,弃学归来的学子们没有再返回日本续学。查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在1938—1945年的赴日留学生统计表上,均记载为“零”。

虽然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学生,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已经终结。因为,除伪“满洲国”继续派遣留日学生外,关内各个汉奸政权也向日本派遣留学生,并以此作为一项维系日伪“亲善”和“共存共荣”的重要方策。此外,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因无处可投而自备资斧赴日求学者也颇有人在。因此,在国统区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之后,沦陷区的留日活动仍赓续未绝。虽然留日人数已经不及战前之规模,但作为日本对华奴化教育的一部分,在中国留学史上仍占有特殊的地位。

一 沦陷区伪政权留日教育政策的实施

七七事变后,相继成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在“沟通中日文化,培植兴亚人才”的幌子下,积极推进奴化留学教

《18学年度至35学年度出国留学人数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5,案卷号12038。

育,使日落西山的留日运动又在伪政权的名义下赓续不绝。以日本东亚学校为例,1936年秋,该校有中国留学生1683人,到1937年秋减至65人,1938年秋略有回升,为176人,1940年秋以后,逐渐增至六七百人。

与伪满的留学教育宗旨一样,华北、华中伪政权亦宣称要“通过留学生教育加强中日两国亲善和协力融和”。由于华北伪政权与华中伪政权常常分庭抗礼,表现在留学教育上,两个伪政权亦步调不一,而且其下属的各个伪省市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时也自行其是。故相对于伪满高度集中的留学教育体制而言,关内伪政权的留学教育呈现出放任和散漫的格局:没有划一的留学规章,没有统筹的留学计划,各个地方伪政权可以自行派遣。

华中方面,南京“维新政府”于1938年7月颁布了留学规程;1939年9月,选拔37名留学生赴日,费用由日本外务省提供。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,伪教育部及广东、湖北、江西、上海、汉口、厦门等伪省市教育厅、局均先后派遣了留日学生。据抗战结束时的不完全统计,华中伪政权共有留日官费生40名,其中广东省12名,湖北省10名,江西省1名,上海市1名,汉口市4名,厦门市5名,海南岛3名,伪教育部4名。这个数字当然不能反映抗战时期华中伪政权的实际派遣人数。

华北方面,据伪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教育总署档案记载,1938—1943年,华北各省市包括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北平、天津、青岛等伪政权,总计派遣留日学生943人,其中官费411人,自费532人。历年派遣人数如下表。

1938—1943年华北伪政权历年留日人数:

《日华学会二十年史》;〔日〕松本龟次郎:《中国留学生教育之回顾与前瞻》,《日本评论》,第2卷第3期,1941年3月。

《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概史》(日文版),1940年3月编,第223页。

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5,案卷号15363。

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2021,案卷号505。

年度	1938	1939	1940	1941	1942	1943
官费		21	114	141	121	14
自费	10	61	206	189	48	18
合计	10	82	320	330	169	32

上表所列人数可能尚有遗漏。据日本《北支那文化便览》所载华北“临时政府”留日学生登记表统计,1939年伪华北留日学生共计224名,比上表所列是年人数超出一倍有余。再据伪华北教育总署的另一份档案记载,1942年3月,伪华北各省市留日学生共计623人,其中官费311人,自费312人。此亦大大超出上表所列1942年的留日人数。

在伪华北各省市中,伪河北省派遣留日学生最多。1940—1944年间,该省共派遣留日官费生212人。伪山西省对留日教育亦甚重视。1939年,伪山西省公署拟定《山西省选送留日学生办法》,规定凡山西籍的高中毕业生,年满19周岁的男女均可报考,考试及格者,由省公署发给留日官费生证明。伪山西省公署对一年一度的留学考试非常重视。每年七八月考期届临,即组织考选委员会,由伪省长、教育厅长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。聘请学界“名流”担任命题官,考前入闱。考试时,由伪省长亲任主考官,披红戴花,对考生逐一点呼,以示隆重。出榜时,在鞭炮声中,将榜高悬于伪省署大门前的照壁上,并将喜报送到中试考生家中。为了加强留日学生的预备教育,伪山西省公署从1942年起在太原日本中学内

〔日〕安藤德器编:《北支那文化便览》,东京生活社昭和十四年版,第40—43页。
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2021,案卷号505。
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2021,案卷号505。

设立“留日特设班”，聘请日本中学教师用日语授课。除正规课程之外，特设班还进行“参拜神社”、“东方遥拜”、“勤劳奉仕”、“精神训话”以及“军事训练”等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。留学生赴日前，伪省长亲自设宴欢送，并邀请日本顾问和日军司令长官参加。在其鼓吹一番“共存共荣”之类的谬论后，还要求留学生向其回拜辞行，表示“感谢”之意。1943年，伪山西省公署以“日晋会”的名义在东京购置一座小楼，起名“日晋楼”，供山西留日学生住宿。为了增强留日学生对伪政权的向心力，“日晋会”经常召集山西留日学生举行宴会、游园和参观等活动，以笼络留学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伪山西省教育厅发表告本省留学生书，令他们“认识时局，保持镇静，安心求学”。从伪山西省政府对留日学生的一系列举措中，不难发现伪政权在留学奴化教育方面确实煞费苦心。

由于日伪对留学教育比较重视，战时留日学生的学业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前。伪政权规定留日学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并通过考试选拔。赴日后，多数能入日本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战时留日学生80%以上在日本专科以上学校就读。这个比例高于战前。伪华北教育总署在一份《公自费留日学生调查报告》中写道：“就大体言之，现在之留学生，其成绩及品行均较事变前为优，以其渡日求学目的单纯，非如事变前之复杂也。”事变前，留日学生确实参差不齐，事变后，由于伪政权加强统制，留学生自身也比较专心向学，不问外事，故成绩反较战前为佳。

再从留学生的专业看，自清末直至战前，留日学生一直偏重文法科。抗战时期，伪政权派遣的留日学生一反过去偏重文法科的传统。据战时留日学生甄审表统计，学习文、法、商、教的留学生只占

崔汉明：《沦陷期间的山西留日学生》，《山西文史资料》，第56辑，1988年。
《抗战期间留日学生学籍、科别、人数、学费来源统计表》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5，案卷号15363。
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2021，案卷号505。

36%，学习理、工、农、医的留学生占了64%，其中尤以学医、学农者最多。析其原因，一是伪政权提倡引导，如山东省伪政权考选留日学生简章即规定官费生以学习理、工、农、医4科为限；二是自费留日学生考虑到在敌伪控制下，学习文法科没有出路，不如掌握一门实用技能更有利于回国谋生。

在战前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均很少设置公费留日名额，公费生大多派赴欧美。抗战时期，无论是伪华北临时政府、伪南京维新政府，还是汪伪政权和各省市伪政权，皆争相拨款设置留日公费名额。日本当局为了利诱中国青年，也提供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。其中以下列3种奖学金最具奴化色彩：

(1)“兴亚院”助学金：“兴亚院”负责控制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思想文化教育。在“中日亲善”和建设“东亚新秩序”的名义下，“兴亚院”通过派遣日籍教师来华和提供助学金协助中国青年赴日留学，严格箝制沦陷区的文化教育，笼络和奴化中国青年。1942年，华北伪政权共派遣311名公费留日生，其中有49名是由“兴亚院”提供经费。

(2)庚款补助费：1923年，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议案，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。为此，日本外务省专门成立对华文化事业部，并从庚款中拨出一部分经费，名义上是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日留学，实际上是用以利诱和收买中国留学生。早在1930年，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其别具用心，就曾明令宣布中国留日学生停止接受日本庚款补助。但日本方面依然我行我素。1937年12月，日本外务省宣称，有94名中国留学生接受其庚款补助。1939年8

《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登记甄审总表》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5，案卷号15355。

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2021，案卷号509。

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2021，案卷号505。

《外务省补助费留日学生校别人数表》，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2017，案卷号179。

月,日本外务省又将 85 名庚款名额分配给华北各省市伪政权,由伪政权负责选送。

(3) 日华育英会助学金: 1940—1943 年间,日本爱媛县松山市日华育英会提供一笔助学金,从中国华北各省市小学生中,先后选拔 18 名十二三岁的幼童前往日本松山市留学,编入松山市师范附属小学校学习。当时日本报纸大肆渲染,称之为“建设新支那的未来人才”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本国内实行全面的战时体制,除频繁地征兵外,对粮食和日用必需品实行严酷的配给制,致使留日学生的生活十分窘迫。进入 1945 年后,情况更加恶化。日军节节败退,日本本土连遭轰炸。是年 3 月中旬,日本当局宣布,为了适应“大东亚决战”,自 4 月 1 日起,全国各学校停课一年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留学生多数束装归国。至日本投降时,留日中国学生只剩下四五百人。

二 战时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

对战时留日学生,自然不能一概而论。就日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的主观动机而言,无疑是想养成一批“高等汉奸”,但客观效果与其主观动机并非一致。战时留日学生人数众多,成份复杂,势必贤劣杂处,良莠不齐,其中产生少数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亦不足怪,但不能因此而将战时留日学生作为一个亲日群体而笼统加以摒弃。

祖国在抗战,同胞在流血,在这种时候负笈敌邦,固然不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明智选择。但当时大片国土沦丧,沦陷区青年学子在

《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》,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 2017,案卷号 174。

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 2023,目录号 5,案卷号 57。

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入虎穴,也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无奈选择。一位名叫吴群棣的留日学生在自传中坦陈其赴日前的心态说:

那时是民国31年,敌人占据广州已有4个年头了。在铁蹄践踏下的广州,到处使人触目伤心。我本来打算回到内地去,但所有外围的交通线都被封锁,始终没法越过难关。找事做固然不愿意,父亲便叫我到伪广东大学去继续求学,也被我拒绝了。居留了一个多月,适值中日文化协会广东分会招考公费留日学生,好些旧日的同学都怂恿我去尝试,父亲更特地替我报了名,我自己也想看看里面的情形,而且直觉地相信准考不上的,便大着胆去尝试。然而天晓得!试验的结果,我竟然被录取了。父亲当然万分高兴,因为他寄予我的期望很大,认为这是我充实自己的千载一时的机会。而我呢,矛盾的心理现象使我备尝了寝食不宁的痛苦。在中学时代,我原也曾有过东渡留学的梦想。可是,自从事变发生,我底梦想成了泡影,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蛮无道,已引起我强烈的反感;多年来的从事战时工作,国家民族的意识已极度的强化;再想想自己的家,在暴日的摧残下,父亲半生心血所积的产业已荡然无存。国恨、家仇,重重压在心中,使我不敢希图那梦想的实现。在彷徨与犹豫的焦灼中,终于我觉得,与其困死在广州,不如走远一点的好。我信赖那“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”的名言,利用这时机去考察敌人的内幕,行径虽属冒险,然而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?”我还希望抓得意外的机会,替祖国效点微力。抱了这种野心,我便毅然地到日本去了。

战时留日学生中,抱着同吴群棣一样心态者为数不少。身陷敌占区,无法投奔内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,四顾茫然,徘徊无路。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,抓住了一次赴日留学的机会。但负笈敌邦,对一名深怀国恨家仇的爱国青年来说,无疑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抉择。虽然前哲有过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明训,但真要认敌为师,心里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。自己内心的焦灼与苦恼既难以排遣,而国人的不予理解更让他们苦不堪言。另一位留日学生在自

《吴群棣自传》,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5,案卷号15355。

传中这样写道:

我们虽不想求人怜悯,但至少希望人家重予我们一种新的认识,藉以解消以往的误解,并改变对于我们的态度。我们想声明的是:一、我们不是没有国家意识的人,因为日本的国家政策充分反映在它的国民社会里,我们是直接接触该社会的人,常常容易受到新的刺激,深的不满,来促进我们意识与观念上的反省。二、战时留日学生在都是清寒子弟而无力投奔内地求学的人,在当时日本强制推行经济管制,物资奇缺的情况下,留学生赴日的目的至少并不是因为贪安逸,求享乐。我们虽无法显耀自己,但自认为对于求学的态度是出于真诚的。

许多战时留日学生战后向国人郑重声明,他们并不是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人。尽管日伪一再鼓吹要将他们培养成日伪亲善共存的“楔子”,可事实上,多数留日学生在战时日本并未受到亲善友好的待遇,相反,经常受到日本军警和浪人的压迫和虐待。一位留日学生在自传中写道:“最可怀恨的是日本警察,不但不许我们出东京一步,并且随时监视我们,一有额外行动,便有坐狱的危险。同去的同学中有遭到这种厄运的,言之犹属寒心!”另一位留日学生亦称:“留日学生受敌人严厉的监视和限制,虽谨言慎行,有时亦不免发生意外祸灾,真是人人自危!环境恶劣,无以复加,精神上所受种种刺激,实为毕生难忘。”可以说,正是这种无以复加的恶劣环境和毕生难忘的精神刺激,不断地促使战时留日学生反躬自省,刻苦自励,并强烈地激发起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。综观战时留日学生,除少数为日伪当局所利用外,绝大多数均潜心求学,没有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,其中有的还参加了抗日反日活动。如经济学家朱绍文 1934—1945 年留学日本,留日后期,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东京宪兵队逮捕。

抗战时期,日伪在沦陷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。一些青年学子抱

《姚颂恩自传》,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 5,案卷号 15355。

《朱丽春自传》,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 5,案卷号 15355。

着与其困死在沦陷区,不如干脆深入敌国的心态,战时留学敌邦,虽然精神上饱受刺激,但日本教学环境较佳,教学设施完备,教授阵容齐整,求学反较沦陷区为自由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,日本国内物价低廉。在沦陷区读书一年的费用,可够开支在日本读两三年所需的费用。虽然日本警察和军国主义者十分可恨,但大学教授中抱自由主义思想者不少,其言论和著述堪称客观,对中国留学生不但不加歧视,有时还予以特殊照顾。留日学生姚颂恩在自传中写道:“日本为支持侵略战争,大肆策动国内民众前往从军。一般文科学生亦均在被征之列。当我升至一年级时,已有大部分学生休学入伍,先生空下来特别为留学生开讲座。我们得以切实与各教授接谈的机会。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拥护军国主义,而实则均已测知日本不久必失败,心中有怨曲而莫敢道言!我们时常聚集好些同学到先生家里听讲,得益殊多。”由此观之,即使在中日交战期间,两国人民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友好情愫,并非所有日本人皆敌。科学不分国界,学问不分畛域,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,各国的文化教育仍有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。在己弱敌强的情况下,取敌之长,补己之短,师敌之长技以制敌,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曲折的救国途径。揆诸事实,战时留日学生中,不少后来学成报国,有的后来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,为民族解放和祖国振兴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。

三 战后留日学生甄审

1945年8月,抗战终于取得胜利,举国一片欢腾。日本本土由盟军占领,其在华傀儡政权也土崩瓦解。战后中国政府一面忙于遣返日本战俘和日侨,一面将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接运回国。1946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《留日学生召回办法》,规定留

《姚颂恩自传》,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全宗号5,案卷号15355。

日学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召回之：1. 学业已告完成或已告一段落者；2. 无力自行继续留学者；3. 其他特殊原因者。教育部对应行召回的留学生，统筹安排返国的交通工具，无法自筹川资者，由教育部予以补助。

在南京教育部颁布《留日学生召回办法》的同时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亦颁布了《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》。日本投降时，留日台湾籍学生尚有近 5000 人。台湾光复后，有陆续返回者，有仍逗留日本者。对于后者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，除专科以上学校的理、工、农、医各科学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，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；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学生，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，并通知汇款接济办法。

战时留日学生被召回后，备受社会歧视。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心理认为，战时求学于敌邦，不是敌伪的奴才，便是亲日的败类。国民政府也认为战时留日学生所学含有奴化毒素，必须严加甄审。1947 年 7 月 1 日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《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》，规定战后召回的留日学生和战时赴日留学业已回国的学生，均应于 194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内向南京教育部申请登记。登记时，须呈缴登记表、保证书、学历证书和自传；毕业于日本专科以上学校者，还须研读“国父遗教”（包括《三民主义》《建国方略》和《建国大纲》和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），登记时，须呈交读书报告，并附上研读时圈点过的原书。在日本军事学校、警察学校、讲习所、养成所等留学的学生，不属此次甄审范围。在日本专科以上学校毕业、经甄审合格者，教育部按其原毕业学校的性质、程度，分别发给证明书。曾在日本中等以上学校肄业、经审查合格者，如欲

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 5，案卷号 15364。

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：《重修台湾省通志》卷六，“文教志·学校教育篇”，1993 年版，第 472 页。

《姚颂恩自传》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号 5，案卷号 15355。

继续求学,可以凭教育部发给的证明书,自行投考国内相当的学校。

为了办理这次甄审事宜,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成立了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,以陈大齐为主任委员,以吴有训、周鸿经、章益、蒋复璁、赵兰坪等 13 人为委员。此外,还聘请了孙本文、郭廷以等 28 位专家学者担任留日学生自传及读书报告的评阅委员。

抗战期间,各伪政权总共派遣了多少留日学生,确切数字已不可考,粗略估计,公、自费生合计在 8000 人左右(台湾籍留日学生除外)。而 194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前往南京教育部申请登记的留日学生仅 450 名。析其原因,可能因为归国留日学生散处全国各地,或因战后信息不通,或因交通不便,不少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赶赴南京参加登记;其次,部分留日归国学生曾在沦陷区任过伪职,为日伪政权效过力,不敢前往登记和接受审查。

从这 450 名登记甄审的留日学生来看,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。(1)战前赴日,抗战军兴时学业未竟而留日本者;(2)沦陷区青年无处可投而自费赴日求学者;(3)由伪政权公费派遣者。

从留日就读的学校来看,这些人分别肄业于 94 所日本专门以上学校。其中接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前 8 所学校依次为政法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京都帝国大学、明治大学、北海道帝国大学、东京工业大学、日本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这次甄审中,只认可 59 所日本专门以上学校的学历。就读其他学校者,其留学学历概不承认。

国民政府对战时留日学生的甄审,其形式和内容均带有思想甄别和学业考查双重色彩。呈交自传,意在令留日学生对其赴日经过和在日学习情形进行自我检讨,自我清算;研读“国父遗教”和蒋氏著作,其目的乃以国民党的正统思想进行“洗脑”,清除日伪灌输给他们的奴化毒素。

在南京教育部甄审战时留日学生的同时,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亦组织了台湾省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,对留日返台学生进行审查。审查办法比较简单,只须将留学证明书、成绩证明书和身体检查书交付审查即可。审查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转学,以便继续完成学业,似无思想甄别色彩。

(作者单位: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)

(责任编辑:刘兵)

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:《重修台湾省通志》卷六,“文教志·学校教育篇”,1993年版,第473—475页。